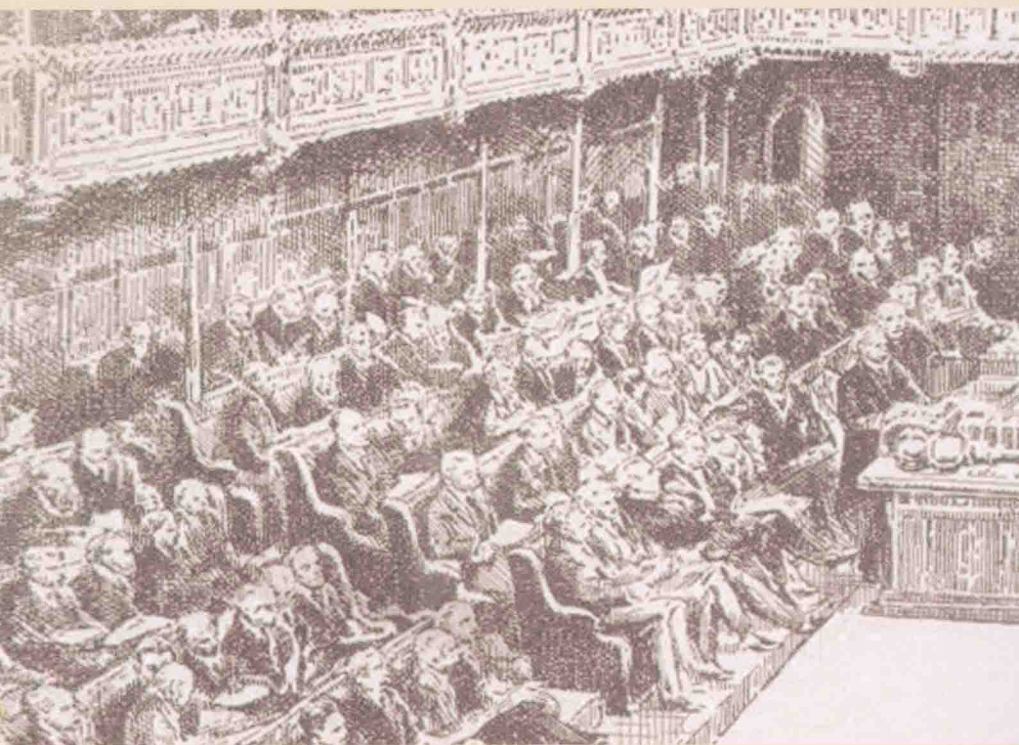


论妥协

On Compromise

【英】约翰·莫雷 (John Morley) 著
启蒙编译所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论妥协

On Compromise

【英】约翰·莫雷 (John Morley) 著

启蒙编译所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妥协 / (英) 莫雷著 ;
武汉启蒙编译所译 .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14
ISBN 978-7-5520-0613-1

I . ①论… II . ①莫… ②武… III . ①政治社会学—研究 IV . ①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1958 号

论妥协

著 者 : (英) 约翰·莫雷
译 者 : 启蒙编译所
责任编辑 : 章斯睿 唐云松
出 版 人 : 缪宏才
出版发行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印 刷 :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 890 × 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1.5
插 页 : 4
字 数 : 25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613-1/DO · 000 定价 :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约翰·莫雷肖像

出版说明

《论妥协》是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英国著名自由主义政治家及评论家约翰·莫雷（John Morley）的代表作，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急欲摆脱西方控制、追求独立的亚非洲国家，如中国、巴基斯坦等，有深切的影响。

“compromise”一词，胡适译成“姑息”，严复译成“得半”，民国初年章士钊译为“调和”，后来据日文翻译，定名为“妥协”，成为通行译法。

《论妥协》一书在民国初年，在知识界广泛阅读和引用，时被称为《调和论》。莫雷的“妥协”思想，与密尔（John Stuart Mill）、斯宾塞（Herbert Spenser）等人的类似思想一起，对“五四”时期的思想潮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思想界的人物在谈论革命的同时，也注意汲取英伦传统里崇尚宽容和妥协的政治精神。胡适尤其喜欢此书，大量抄录了其中的内容。他说：“友人以英人莫烈之《调和论》相假，读之不忍释手，至晨时二时半始毕，手抄数节。”1930年，胡适推荐给青年人的十本书里，《论妥协》就名列其中。

这本专门谈论“妥协”的经典著作，所述范围甚广，涉及政治观念、宗教思想、家庭伦理等领域。作者并非一味拥护妥协观念，他花了不少笔墨讲述妥协之原则，即何种情况下该妥协，何种情况不该妥协，依据为何。《论妥协》传达的思想和政治智慧，不论在当时还是现今，对个人生活还是社会政治，都很有参考价值。

遗憾的是，此书问世一百三十年，众多民国学者征引推介，却一直没有中译本问世。启蒙编译所克服困难，首次翻译成中文，以期填补思想文献的空白。同时将英文原文（1886年版）附在译文后，供研究者参考。

说明

借推出新版本的机会，作者自己在脚注中增加了三四个注解。对第一版的批评无需回应，故而不予评论——或许除了一点，即这册小书只是随笔，没有过多的野心。它从未打算自命为运用诡辩的全面专著，所以请勿用那种标准去判断它的表现。本书只是为了引出问题，敞开讨论，提出事例，廓清纲要——与一般随笔所做的一样，这个过程可能适度地附带了其本身的用途和利益。

1877年5月4日

我们将真理置于首要还是次要位置，
这决定了世间的一切差异。

——理查德·惠特利¹

1. 理查德·惠特利 (Richard Whateley, 1787—1863 年)，英国修辞学家、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和神学家，曾任爱尔兰都柏林的大主教。

目 录

说 明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二章 错误的可能效用 / 25

第三章 理智的责任与政治精神 / 49

第四章 宗教方面的从众 / 83

第五章 意见的实现 / 117

自由理论（第 139 页的注解） / 153

译名对照表 / 169

英文附录 / 173

第一章 导论

本书主旨；陈述的问题；英国当前的一些趋势所暗示的；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对这种比较的验证；特定优点的欠缺；近来一些抱负的历史与衰落；说明；当前心态的特征；对其成因的分析：（1）法国的影响；（2）历史方法的影响；（3）报纸新闻的影响；（4）物质繁荣的增进；（5）思想的精神基础之转变；（6）国教的影响。

我们在实践运用各种各样适应环境、功利算计、处事交往、从众或妥协的技能时，都受到合理理由的限制。本书计划以简略而直接的方式，讨论加诸于我们的一些限制。如今，凡是有最小可能性主导未来的思想学派，都在某种意义上接受了这种原则：人有自由思考和独立行动的权利，在运用理智时不过度敬畏权威，在决定生活方式时不盲目服从习俗。那么，在怎样的环境中，这种权利才得以行使和正当化，并在理论上得到认可，从而成为实践上的正面责任？假如多数人势必要容忍与主流意见和信念的分歧，那么在怎样的条件和限度

下，这种容忍势必对持异议者有利？当天平的一边是当前的实际便利或者流行的偏见，一边是真理时，我们应当用怎样的方式权衡选择，应当作出多大程度的妥协让步？当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感情和信念作出重要决定、表述想法或行动的时候，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容许其他人的感情和信念影响自己？如果我们从中没有得出任何实用的推论，是否就只能维护一般的原则？任何思想都是屈从于现有条件、放弃优先权和绝对支配权吗？即刻的效果和普遍的可行性，是检验一项政策本质是否合适的主要标准吗？

要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就相当于尝试概括生活和责任的全部细节，综合论述良知的事例，为怀疑者提供全方位的指引。本书的作者并无野心，目标只是探寻一两种最普遍的原理，将之应用于实践，为解决某些困难指出方向。

这类研究需要一套既定的社会条件来匹配，这是相当常见的情形，好在它们比较容易理解。关于妥协和从众的权宜之计，存在一些共同规则，但是其运用牵涉到无止境的变化和最广泛的灵活性。发现这些不明确的规则与实际状况的关联，将其转换成实用指南和真正的诠释，并在遇到特殊而类型确定的紧急情况时，帮助我们在思考和行动中作出正确和最佳的选择，是既有趣又有益的事情。根据作家和说教者的流行论调，即使天崩地裂，人类也应当坚持真理和正义，这是凌驾一切的原则。理论上，人们普遍接受这个原则。无论对于权威和传统的拥趸，还是对那些最绝对、最坚定的唯理

主义者而言，这已是陈词滥调。然而在实践中，所有学派都不得不承认，为了真理本身，有必要采取适应环境的措施。狂热者之所以声名狼藉，恰恰是由于他们拒绝让步，损害了善的事业，用不明智的办法推广自己的意见，激发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偏见；他们做事不留余地，不考虑动机，没有意识到那些符合条件的原则，而若要使自己的原则实现并适用于特定的社会，本来必须遵循那些原则。明智的做法是在形成意见时考虑再三，在表述意见时有所保留，在实现想法时谨慎持重，与之相反的态度，是不愿开诚布公而自我欺罔、自愿地虚饰、堕落和懦弱。这些就是妥协的三个部分或领域，显而易见，与妥协相关的有趣问题在于如何划分其间的界限。而这个界限就是我们的主题（参见第三章）。这个问题主要与时代和环境相关，如果围绕着我们最熟悉的时代和环境，或者至少是我们察觉的最迫切之需求和不足展开讨论，也许能得出最满意的结果。

尽管英格兰大胆的真理探索者们参与了大部分领域的探索，但整体而言，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仍然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明显的确证，即对于所有普遍原理的深切不信任，对于反复提及它们或者授予它们实际权威的任何安排都极度厌恶，沉默而最执拗地用政治手段检验哲学真理。“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一位实验者如是说，“要让一个英国人上升到教义信条的高度，可并不容易。”困难远远超出了神学教义的范畴。权宜之计与原则之间的假想对抗曾经也

许拥有过真实的意义，可是那点意义早已不知所踪，如今它代表着至上的、最重要的智慧，将狭义的、当下的、个人的权宜之计视为一切，整体、普遍、终极和完全的权宜之计却毫无价值。所谓原则只是另一种代名词，相当于表示这种更大规模权宜之计的术语。当原则遭到蔑视并被放逐到哲学家和研究者的遥远梦境，就只剩下矫情的崇敬；而在物质主义时代，那实质上是最过分的轻蔑，这种情况只意味着人们过多地考虑当下利益，却几乎不去顾及未来更多的利益。这意味着不利的时代环境，既无法形成有洞察力的开阔视野，向我们揭示某种行动或意见所产生的后果，又无法养成公正无私和勇敢无畏的精神，使我们愿意牺牲自己当下的安逸或便利，寄希望于未来替自己或他人赢得更大的优势。

让我们以政治为例。如果从最广泛的层面上看待国民生活，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将是什么？德国人的梦想是他们伟大的祖国不仅统一强大，而且在适宜的时期赢得自由，变成不可侵犯的家园，让其他人也可以分享自由和秩序带来的温暖。西班牙人的梦想，或是以好战表示对上帝、圣徒以及被流放王族的忠诚，或是投身于新近赢得的自由，振兴他们没落的国家。尽管政治上的堕落掩盖了民主试验的伟大成就，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仍然足以激发一个美国人的幻想和热情，使他相信他们将在新世纪拥有美好的未来。尽管狂乱和“愚者之怒”曾经造成了红色或白色恐怖，法国人，无论是共和派，还是保皇派，仍然拥有希望、梦想和抱负，

藉以充实自己的生活，跳出可悲的利己主义小圈子。那么我们英国人的希望和抱负又源于何处？无疑既不是来自上天也不来自大地。在想象力领域，英国人不属于易动感情的民族。不过尽管欠缺想象力，但我们已经开创出有益的事业，建立起一个强大而慈善的帝国；为正当的目标坚决斗争是我们极好的历史传统。虽然我们不可能总是追随外国盟友和拥护者的超越性脚步，但英国已然成为遗世独立的伟大事业之发源地。英国人即使不擅长想象，也擅长掌握解放的原则。如今英国从事的本国或与别国有关的重要政治事业是什么？如果说全部重要事业都已完成，那么这就意味着人类发展到达了最后阶段，人类进步历程的最后一页已翻过。当我们说出并相信这句话，就标志着国家或民族的终结。毕竟在突然爆发革命之后，致命的疲惫占据了天主教社会，也可能侵袭我们古老的新教徒精神，影响我们的理性和精准而稳定的政治能量。

我们不会忘记在欧洲大陆的现代政治进程中留下印记的那些愚蠢行径或邪恶罪行。我与其他人一样敏锐地意识到法国人的轻率和德国人的傲慢。在某些方面，普通的法国平民确实可能与普通的英国平民一样，是可悲的利己主义的牺牲品；若论对某些意见的宽宏大量，美国人也未曾超越我们。重要的不是普通人的思维和态度，而是非凡人物的思维和态度。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决定性标志，要从那些领袖或应当成为领袖的人物身上寻找。检验人民健康状况的手段，在于

人民代言者的言论，在于被人民接受或选为首领的人的行动。我们必须注意最主要的思想者所关注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的精神达到的高度。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致力于什么事业？他们是无畏地扩大斗争规模和幅度，还是蹑手蹑脚、畏畏缩缩地前行？无论那些人才伟大抑或渺小，这些问题的答案同样适用于其他问题。根据寻常规律，办事方式往往与办事结果同等重要。前人曾不止一次指出过，英国的行动虽然值得称赞，自我表现的方式却始终拙劣自私，以致欧洲其他国家只能从中看出诡计和凶险的企图。我们的公众舆论经常富于智慧，但是缺乏相应的勇气。我们实现了高尚的功业，然后自鸣得意地替自己寻找卑鄙的理由。

我们或许可以用堂皇这个词描述英国人的思维、表达方式和行动的某种特点。举例来说，我们注意到，培根（Francis Bacon）的作品里包含的某种崇高的构想或蓝图，比他的本质优点更能吸引和打动我们。这种特点并非毫无意义的虚饰。它不像戏剧的面具或半高统靴之类的巧妙道具那样，仅仅强加给我们不真实的高度或庄严的印象。堆砌起来的崇高是虚假的，高远的目标和高尚的表现才是真正的力量。它们渐渐变成我们的责任。崇高的最确定因素之一，是对个人价值抱有自豪感。假如狮子喜欢披上驴皮来伪装，那不是谦逊或矜持，而是愚蠢无能和自甘堕落。假如英格兰竟要屈尊俯就于微不足道的事业和平庸的理由，那就更加可悲可叹，因为我们的立国之本是如此威严，我们的王道在全世界无可匹敌。我们

的语言使用范围最广泛，我们的文学无论种类还是影响力都不逊色于其他人。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两国的人民早已勇敢地实行自治，取代了暴君独裁的原始手段。我们理解，和平与工业是现代文明最不可或缺的两大条件，并根据这种信念制定我们的政策。不幸的是，由于祖先骁勇善战，我们不得不继承了统治成百上千万外族人民的任务。我们从事这个任务时不带偏私，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技巧实行管理，纵使时间将证明这种状况是无解的难题，其成果也依然令人赞赏。这一切都是真正不同凡响的表现：它们的作用是激发最崇高的民族生活意识；它们的激励理应让我们的言辞充满权威，让我们的行动慷慨大度而勇敢坚定，让我们的建议具有十足的分量和影响力。

然而在过去四十年里，英格兰逐步失去了那些热情——它们本来可能成为梦想，虽然其中一些无疑只是幻想，但至少证明了我们中间存在这种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积极相信有可能存在普遍适用的正确理论，同样相信我们有责任用理论指导实际的行为和欲望。上一代人曾经真切地同情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因为他们受到民族学说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待美洲黑奴贸易制度的态度却不够嫉恶如仇，因为他们内心的正义、人道和宗教信仰不够真实强大，无法听信美国政治家用来替顺应潮流、折中妥协辩解的政治借口。他们对议会改革有深厚感情，因为谬误的原理灌输进了他们的头脑——或是认为让社会的主体掌握政治权力是针

对危险政府的唯一有效保障；或是认为让公众参政、即使只是以最适度的形式运用选举权，也能起到提升和指导的作用；或是认为社会正义要求让那些被迫遵守法律、向国家纳税的人在制定税收法律时应当也有发言权。

或许可以说，正是这些抱负致使公众的热情和感受热情的能力衰退了。如今它们大多数均已实现，从愿望转化成了现实，然而其结果却如此令人失望，以至我们不禁开始怀疑这些努力是否值得，我们的祈祷是否让世界进步了哪怕一点点？奥地利人退出了意大利；教皇不再是罗马的主人；匈牙利的爱国者现在拥有了他们的权利，变成了昔日敌手的朋友；黑奴被改造成了美国公民。而在本国，神明听取了我们的誓言。我们改革了议会，建立了期盼已久的选举自由的保障机制。我们完全不再追求这些事物，读者或许会说，那是因为我们的梦想已然成真，我们的愿望化作了现实。然而最后，展现在眼前的是比较平淡乏味的成果；可能在令人沮丧的同时，它们使我们的政治想象力冷静了下来。远观时如此辉煌的荣耀，一旦触手可及，却显得微不足道，因而摧折了政治幻想的锋芒。昔时的抱负已不复存在，却没有新的抱负填补空缺。不管原因为何，我都要如此表述这个变化：无论既存的是何种秩序，如今它都几乎无可争议地压倒了我们的思想，最粗糙的政治标准却没有受到怀疑，并最终运用于人类思维的整个领域。

了解在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新闻界和统治阶层所处的立场，